

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

三晋石刻大全



● 长治市黎城县卷

主编 王苏陵



三晋石刻大会

总主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晋石刻大全. 长治市黎城县卷/ 刘泽民,李玉明
主编;王苏陵分册主编. -- 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457-0645-1

I. 三… II. ①刘… ②李… ③王… III. ①石刻 -
黎城县 - 图录 IV. ①K877.4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1192 号

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黎城县卷

总 主 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本卷主编: 王苏陵

责任编辑: 吕文玲

审 订: 杨 淮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 4956036 (综合办)

0351- 4922203 (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黎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1092mm 1/8

印 张: 85

字 数: 62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645-1

定 价: 50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78-7-5457-0645-1



9 787545 706451 >

封扉题签：姚奠中



《三晋石刻大全》编纂委员会

顾问：薛延忠 金道铭 申维辰 申联彬 李小鹏 高建民
胡苏平 张 平 李立功 胡富国 白清才 郭裕怀
杨安和 李学勤 姚奠中 张正明 令政策 李潭生
刘 江 张 领

主任：刘泽民

常务主任：李玉明

副主任：罗广德 李茂盛 刘在文 田中仁 雷忠勤 柴泽俊
刘纬毅 降大任 郭士星 赵望进 杨子荣 储仲君
邢利斌 梁俊明 张玉洁 崔正森 贾玉瑞 翁小绵
陈 明 于贵卿 宋新梅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敏政 石金鸣 史耀清 刘光彦 齐荣晋 张鸿仁
吴广隆 李 尧 李 非 李小强 刘合心 高 可
董占锁 董瑞山 潘孝忠 霍润德

总主编：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李玉明

副主编：罗广德 李茂盛 杨子荣 文 琴 张继红 落馥香

审 定：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编纂指导组

顾问：田喜荣 张 保

组长：王玉圣

副组长：史耀清

成员：王占禹 张培民 欧蜀渝 牛玉山 弓德旺 马书岐
鹿 敏

《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黎城县卷》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郜双庆 郝献民

主任：郭俊芳

副主任：刘永清 杨增元 王苏焕 孙广兴

委员：张福柱 张理中 段联刚 王宽明 王苏陵 王晋辉
李亚东 赵晚芹 张起云 郭春堂 张建考 赵满芳
张文忠

主 编：王苏陵

副 主 编：赵满芳 郭春堂

委 员：赵小辉 王利斌 李红兰 张云刚 刘爱生 韩桃英

凡 例

一、以抢救和存史为收录原则。收录范围：以《三晋石刻总目》为基础，凡古代、近现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现存和佚失石刻全部全文收录（其中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社会文化价值的私人墓碑等除外）。收录上下限：上限从本地最早的石刻起，下限到定稿为止。

二、以县（市、区）分卷，原则上每县（市、区）一卷，另有山西省博物院卷、五台山卷、晋商会馆卷和总目卷。

三、“概述”为一个县（市、区）或石刻收藏单位总论性的文章，既有资料性，又有学术性，内容主要包括：石刻历史发展（收藏）演变情况、现在分布区域、类别、时代、数量和保存情况，重要石刻简述、主要特色和价值评估、保护和利用建议等。

四、石刻单位称谓：各类碑刻（包括造像碑）一律称“通”；石碣（或刻石），称“块”或“方”；经幢（包括石幢）称“尊”；墓志和墓志铭，有盖的称“盒”，无盖的称“方”；画像（图像）石、匾额、塔铭、法帖，称“方”或“块”；摩崖题记称“处”或“条”；石柱，称“根”；戒牒，刻在碑上的称“通”，刻在碣上的称“方”或“块”。石刻录文称谓：碑，称“碑文”；碣（刻石），称“碣文”或“刻文”（镌刻诗赋的，称“诗文”）；造像碑（含座），称“发愿文”；墓志铭和墓志，称“志文”；石匾，称“匾文”（镌刻帝王诏令的，称“敕文”）；摩崖题刻、画像石、石幢（内容非经文者）、石柱等，称“题记”或“题刻”；经幢，称“经文”；塔铭，称“铭文”；墓表，称“表文”；石对联，称“联文”；戒（度）牒，称“牒文”；法帖，称“帖文”。

五、不设篇、章、节，一件石刻独立成篇。全卷录文分两部分，即现存石刻、佚失石刻。以县（市、区）为纲，分别按时代顺序排列，不分类。

六、每件石刻编纂内容包括“名称”（全称）、“简介”、录文（全文）。另附照片或拓片。

七、凡属涉及人物的石刻，在“简介”中介绍人物的生卒年、籍贯、主要官职、生平事迹、著述等。凡涉及人物籍贯的，一律用原地名，括号内注明今地名。如郭泰，太原界休（今山西省介休市）人。

八、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不少石刻陆续由原址搬迁到异地，这部分石刻均以现收藏单位收录，地址一律按原址书写，然后注明搬迁时间和地点。

九、真假或断代暂无定论的石刻，可沿用旧说或存疑。有几种说法的，诸说并存。

十、纪年：1912年以前的石刻一律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如唐贞观元年（627）。括号内公元年号前后不加“公元”和“年”字。1912年以后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用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如中华民国16年（1927），也可写成“民国16年（1927）”。民国年号用阿拉伯数字，不用汉字。1949年10月1日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十一、表示体积、面积等尺寸的，以“厘米”为单位。如长（或高）120、宽60、厚80厘米，长、宽均不加“厘米”二字，用顿号间隔。

十二、收录的石刻文字原为繁体字的，仍用繁体字；原为简化字的，仍用简化字。1957年汉字简化之后，有的碑繁简混用，录文尽量保持原貌，以保存史料的真实性。录文横排，原则上根据文意分段，不易分段的，可以连排。编者所加文字，用楷体字，并加圆括号，以与正文宋体字区别。如“（碑阳）”、“（碑阴）”等。

十三、收录的石刻文字，只作标点，不作校勘，原文中的错别字、异体字、通假字及不当之处等，保持原貌，不作甄别、注释和括注。

十四、石刻文字漫漶、剥泐不清的，用一字一“□”表示。漫漶、剥泐字数不清的，用“……”或“下阙”表示。

十五、索引按类编排，使本书既可按历史顺序阅读，又可按类检索，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总序

李玉明

石刻,指镌刻有文字的历代碑、碣、造像碑、经幢、石幢(内容非经文者)、摩崖题记、墓志铭、画像石等,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石刻,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专指“碑”;广义的理解,包括碑、墓志、造像等各类刻石。

所谓“碑”,汉以前就有了,但那时的碑不是为了刻字,而是立于宗庙、学校,用以观日影、记时刻、测方向的。古代礼仪规定,主人迎宾进宗庙之门要当碑而揖。祭祀时亦常常把祭祀用的牛羊等牺牲先拴于碑上。碑在古代还有另一种用途,是立于墓前用于棺木下葬,称为“窆石”。下棺时用以固定轭轳,所以早期的墓碑中上部有穿,称之为“碑穿”,用以系绳下棺;在宗庙之碑则为系牺牲的牛羊所用。因此,最初碑的用途并非为了刻字,而是实用。

现代意义上的“碑”,兴起于西汉而盛于东汉。原来在西汉以前,即商周时期歌功颂德的文字铸刻在钟鼎彝器上,西汉开始以石代金,用碑记载功德和事件了。这即是金石铭文的由来。

从西汉“碑”开始镌刻文字以来,历朝历代的碑刻大体相似,均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但各类碑之间又呈现繁多的样式。碑头有圭首、圆首、平首、梯首、冠形首、螭首等。碑身以长方形为多,另有倒瓶形,六棱、八棱形,正方柱形,扁方形等。碑座有龟趺形,形状庄重,采用得最多。古人以龟为长久,常常以龟(实际称赑屃)背碑。碑的内容有功德碑,记载文臣武将的文治武功;庙碑,种类繁多,记述庙的修建历史;墓碑,记载死者籍贯、世系、事迹及卒葬时间等。还有记事碑、纪念碑、文告碑、诗文碑等。

从现代广义上讲,凡是镌刻有文字的石刻都可以称为碑刻,而在先秦时除“碑”以外,其他都不称碑,而称“刻石”。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刻石是商代的《小臣系毁》和一些石磬刻字。以后有秦石鼓文,秦始皇峰山、泰山、琅琊台刻石等。汉以后这些刻石逐渐统称碑石了。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道教兴起后,又出现了宗教刻石及造像。山西是我国中原地区宗教刻石最早产生和发展的省份之一,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以及现在散存在全省各地大量的经幢、石幢、造像碑等刻石,见证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轨迹。另外,作为墓碑衍化物的墓志,起源于汉代,形制为长方形。而标准方形的墓志则兴起于魏晋南北朝,大盛于唐,是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山西现存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志,封和宠、辛祥墓志;北齐裴良、庾狄回洛、娄叡墓志;东魏刘懿墓志等。

石刻最大的特点,是能长久地保存下去,故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简称“石史”。它最大的功用,是可以证史、补史和纠正官修书面历史记载的舛误,在弘扬民族文化,借鉴历史经验,在为社会主义政治、物质、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来受到地方当局、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爱好者重视。例如,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殿堂式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1937年梁思成先生调查发现后,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殿前镌刻于唐大中十一年(857)的经幢,解决了该殿学术上的两大问题。一是根据经幢的记载,该殿始建于唐德宗大中十一年(857),不仅使该殿是唐代建筑得到了有力的佐证,而且使这座国宝级文物建筑有了准确的纪年,其学术价值大大被提升。二是从这幢经幢的记载中得知,佛光寺东大殿的施主(即捐资人)是长安官宦人家出身的女弟子“宁公遇”。由于施主的身份高,其建筑的级别也相应被提高。又例如,山西现存一万八千多处古建筑,其每处建筑的历史沿革,要么文献记载简单,多数只一句话;要么查不到任何记载。而这些建筑前前后后的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主要靠现存碑刻的记载来解决,因而各座古建筑附属的碑刻就成了该古建筑历史沿革有力的证据。再例如,山西历史上的灾荒不断,元大德七年(1303)平阳、太原地区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清光绪三年(1877)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死亡百姓不计其数,并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这些灾荒,由于历史的原因(如信息不畅),或是地方官员为保乌纱帽,有意隐瞒,因而文献记载零碎简单,甚至缺失无记载。而

民间百姓在灾荒过后却镌刻了不少碑刻,使后人永志不忘。这些灾荒碑虽有不少毁于战火,或被人为破坏,但各地保存至今的仍有不少,已成为研究山西历史地震、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宝贵资料。除灾荒碑外,存世的还有不少古代科技方面的碑石,是研究当地农林水利、医药等发展的重要实证。三晋石刻是我省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人文资源。因此,编辑出版《三晋石刻大全》,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是功在千秋、荫及子孙的一件好事、善事。

自宋代兴起金石学以来,访求石刻是历代众多史学家、方志学家们的终生爱好和追求。山西自明成化十年(1474)创始《山西通志》时,就收录了“金石”资料,现在能够作为代表的是清光绪年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编的《山右石刻丛编》。这套《丛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版,共40卷,收录北魏至元代计14个王朝840余年的各类石刻720通(件)。还有在此之前于光绪十八年(1892)官修的《山西通志·金石记》(单行本称《山右金石记》),杨笃(秋湄)主编,收录汉以来碑刻1550余通。《山西通志·金石记》与《山右石刻丛编》比较,前者“有则录之,存亡不计”,后者“存者收录,亡者不述”。

山西历史上石刻最多时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准。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文物部门的多次调查和普查,山西现存各类碑碣大约两万。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大抵晋碑皆萃于蒲、绛、泽、潞四属。”四属原都称州,大体上是现在的运城、临汾、晋城、长治四市,即山西南部地区。《山右石刻丛编》收录的720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496通,占全省的68.9%;《山西通志·金石记》收录的1550余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993通,占全省的64%;现存的两万余通石刻中,上述四市占了全省的一半以上,叶氏的论断基本是正确的。但除上述四州(四市)外,其他地区也有不少碑刻存世,其中不乏精品,同样应予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门和有关部门、团体,以及个人爱好者在石刻的调查、保护、拓印、研究、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比较零星分散,缺乏全面性、系统性;也没有一个专门访求石刻的机构,使这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制约。其次,历史资料少而缺失,已出版问世的石刻著作,存量极少,不仅难求,而且收录不全。比如,《山右石刻丛编》和《山西通志·金石记》均只收录到元代,且遗漏不少,大量明清时期的碑刻未被采摭,造成历史的遗憾;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只收录山西唐以前碑石45通;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只收录山西元以前碑石近30通。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大量的拾遗补缺工作。第三,建国以来又新发现了大量的石刻,特别是新发现和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墓志铭、摩崖题记、造像碑等,大大丰富了山西石刻的研究资料。比如北朝至隋唐一批重要墓志的出土、黄河沿岸等处汉以来漕运摩崖题记和一批早期造像碑的发现,以及其他一大批新发现石刻的著录登记等,都是重要的石刻资料,这些都需要有人去进一步访求和研究。第四,石刻文物具有不能再生性的特点,毁一件即少一件。比如北周武帝二次灭佛,山西的汉碑及三国两晋碑除郭泰碑外,全部被毁。郭泰碑后来也流失不存,造成了“山右无汉碑”的历史遗憾。当前仍存在盗窃和建设工程中人为破坏石刻文物的严重现象,自然损毁也日益加剧,古老石刻随时都有流失和被毁的危险。因此,抢救保护石刻,将其全部著录在册,世代流传下去,是当务之急,是带有抢救和存史双重重要性质的宏大工程。

为了全面系统地开展三晋石刻的访求和研究工作,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即借鉴历史经验,适应形势的需要,挑起了保护研究石刻传统文化这个重任。从1990年开始,即着手分市编辑出版《三晋石刻总目》,到2006年底,已有9个市《总目》正式出版,共收录存碑11878通,佚碑4168通,合计16046通。

在基本完成《三晋石刻总目》编辑出版的基础上,从2007年正式开始编辑《三晋石刻大全》。《大全》以《总目》为基础,将新中国成立前后不论存佚,有文则存,全文抄录,并断句。同时,每篇加“简介”,附照片或拓片。基本上每县(市、区)1卷,山西博物院和五台山、晋商会馆各1卷,再加记事总目录1卷,全省预计125卷。

分步编辑出版的山西石刻研究成果,其资料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将远远超过以往出版的石刻著作,将成为山西有史以来的首创之作,流芳后世,意义深远!

是为序。

序 一

史耀清

长治历史悠久,史称上党,又称潞州,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现辖二区、一市、十个县。长治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积淀保存了许多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各个历史时期遗存的碑碣石刻就达数千通(处)之多,历来为人称道。清代学者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大抵晋碑,皆萃于蒲、绛、泽、潞四属。”

历代碑碣石刻,集记史、纪事、文字、文学、测图、绘画、纹饰、书法、选石、摹勒、镌刻、雕凿等于一体,不仅是我国传统的一种文化形式,还是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珍贵文化遗产。尤其石刻文字具有地方性与民间性的鲜明特色,直接或间接地记述了当地的人文地理、重大事件、民俗民风、自然灾害等等,可以说是一种公开的历史档案,对于研究一方地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民俗、艺术、科技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长治市十分重视石刻文字的收集整理。上世纪末,按照省三晋文化研究会的统一部署,市三晋文化研究会曾组织各县、市、区理事,对于全市范围内留存的历代碑碣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造册,登记收录了上自北魏、下至民国各个朝代的碑碣 1800 余通,搜集碑文数百篇,编辑出版了 20 多万字的《三晋石刻总目·长治市卷》。这部《总目》,对于长治市编撰《三晋石刻大全》长治部分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览这些碑刻,遍布全市 13 个县(市、区)境内。从形制上可分为摩崖石刻、铭文画像、人文景观、建筑构件、帖刻原石、经文石鼓、石制器物、界桩界碑、砖陶铭刻、墓志铭、经幢 11 类。从内容上分,有历代各类建筑及自然或人文景观处所镌刻的纪事、施缘、题匾、题名、题联、题景、记游、诗文、记时等碑碣;有皇帝及官府、官员等的敕文、牒文、法令、训令、座右铭、手书、诗文、法书等碑碣;有历代名人神道碑、功德碑、墓表、行状墓志等碑碣;有宗教经文碑;有中医药方碑;有平面镌刻图画碑;有各种乡规民约、契约碑;有天灾人祸纪事碑;有公共事业纪事碑;有名人手书、诗文及书法绘画碑;有分界碑;有革命烈士及事件纪念碑。从年代上分,纪年最早的为沁县南涅水村出土的《永平二年胡保兴造像铭文碑》,时代为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509)十一月。其余纪年时代依次为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石刻形制之多样,内容之丰富,年代之久远,分布之广泛,可谓名闻三晋,声动九州。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长治市的历代石刻多有佳品,其文化品位、书法艺术、刻工技巧、造型设计等浑然一体,别具一格,匠心独创,巧夺天工,对于推动当地文化研究、文化发展、文化繁荣以及艺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弘扬三晋文化乃至中华民族文化,是一笔拾遗补缺的宝贵财富。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到 90 年代,在沁县南涅水村先后出土北朝至宋代石刻造像约 1126 件,被专家誉为中国古代民间石刻艺术珍品,称之为“北魏石刻群”,在全国雕刻艺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山西省政府把此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央、省、市拨专款修建南涅水石刻馆予以保护,成为当地近年来游客观光的首选景点。另有长治县东呈村的《赠代郡太守程哲碑》,勒石铭文洋洋 1400 余字,记述了这位籍贯长子的官员的家世、生平、品行、事迹、官职等。此碑立于公元 534 年的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碑额题“大魏天平元年岁次甲寅朔三日壬午造讫”。可见长治民风淳朴,自古尚贤,敬重好官,勒石纪念,并为当今写史修志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而且,文字书法上承东汉劲直派分书之余绪,又融以汉魏砖文书风,是北朝直笔隶意真书流派中的典型代表,侯镜昶先生著《书学论集》收录此碑,评价颇高。再如唐代碑刻不但数量多,品种全,而且行文、布局、雕艺均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长子县《白鹤观碑》、《大唐郑惠王石记》,长治市《未刻完唐碑》、《李抱真德政碑》、《王深墓志铭》、《朱府君墓志铭》,平顺《明惠大师铭记》,襄垣《大周连简墓志》,黎城《唐故处士王君之碣》等碑碣,形制各异,正、行、草、隶、篆等书体俱备,书法刻工精致完美,行文记事简洁流畅,堪为其中精

妙弘美之代表作,历代金石著作中多有著录和赞美。《大周连简墓志》字兼行、楷、草、篆四体,又有武则天自身造字等,被列为国家二级文物。《唐故处士王君之碣》是长治目前发现的唯一一通隶书碑碣,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出土于黎城县西10余公里东西柏峪村附近,新中国成立后移置县文博馆藏,后又转藏于省博物馆。此碣形制特殊,为八棱八面幢柱形,有座有顶,标题与落款为篆书,正文为隶书。碣文记述王庆的籍贯、出身、生平始末等,为正史所不载。光绪二十三年(1897),山西巡抚胡聘之将其著录于《山右石刻丛编》,并题跋赞:“碑文字皆渊茂古劲,得汉人家法,字波磔流利,神似曹全碑,在唐碑中足称神品。以出土较晚,字画极完整,仅泐一字,洵可宝也。”再如沁县宋元丰三年(1080)《威胜军新关侯庙记》,平顺东河村《重修圣母之庙》碑,为近年来山西发现的三通宋代有关修建戏楼、舞台碑刻中的两通,记载了早期我国中原地区农村舞台修建情况,反映了我国乐舞与戏曲的独立与成熟,对于中国戏剧发展史的研究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等著作,多次选登了此二碑的拓片和文字。再如长治县元延□元年(1314)《神农庙碑记》,长治市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前上党县达鲁花赤忽都帖木儿德政记》,平顺县明嘉靖七年(1528)《虹梯关铭》,长子县明嘉靖十年(1531)《宣圣遗像碑》,武乡县南神山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地震碑》,长治市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千手观音画像碑》,沁县清代《康熙诗刻》、康熙五十年(1711)《吴□御祭碑》、乾隆七年(1742)《致远堂法书陶渊明拟古杂诗手迹帖刻》原石,长子县乾隆五十五年(1790)本地名士冯士翹集韩愈字《纯阳祠诗文书法碑》,潞城市民国年间(1912—1949)《葛井岭禁伐树木碑》等,堪称元、明、清、民国碑刻的代表作,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极高的艺术品位。尤可称道的是,明、清两代初期,由于统治者的轻文及文字狱盛行,碑刻存者较少,而长治地远山高,碑碣遗存却相对较为丰富。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先辈们也留下了大量的革命遗址和文物,其中碑刻也不在少数,最具代表性的有沁源《抗日阵亡烈士纪念碑》,太行太岳烈士陵园的《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决议碑》、《武士敏烈士碑》等,是今天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史料。

石刻虽然坚硬,也有风化殆尽的时候,加之历史上长治一带是兵家必争之地,又发生过多难以抵御的自然灾害,长治的碑刻在新中国成立前损失不少。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在组织编撰《总目》的基础上,又发起了编撰《三晋石刻大全》,这是一次对历史文化的抢救,更是一件泽被后人的大好事。《大全》以县域为单位,每县一卷,编选时间下限截至每卷定稿,这在编选范围和时间跨度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于我们翔实调查登记和精心编撰,对于今人和后人了解把握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轨迹,都具有功德无量的重要意义。

中共长治市委、长治市人民政府,长治市各县(市、区)的领导,对于编撰《三晋石刻大全》十分重视,大力支持,为保证这项工作的预期进度和圆满完成创造了良好环境。各县(市、区)三晋文化研究会勇于担当,不辱使命,科学运作,尽职尽责,为做细做好做精这项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我们相信,《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各县(市、区)分卷的出版发行,将为全市、全省留下一笔宝贵的石头文化资源,为文化强市、文化强省的建设填充一项重要内容,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科学发展起到张风扬帆的给力作用。

序 二

中共黎城县委书记 郜双庆

黎城县人民政府县长 郝献民

《三晋石刻大全》是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由三晋文化研究会组织编纂的一部巨型历史文化重典,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学价值都是无可比拟的。黎城县三晋文化研究会的同志能有幸加入这一浩繁恢弘的文化工程,我们备感骄傲和自豪。黎城县委、县政府对大家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同志们的功绩将同这部典籍一起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黎城县是一个古老的县邑,是五帝之一尧的故里,其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丰厚。2000年,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在靳家街发掘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证明,距今已有四至五千多年历史。2005年,发掘抢救的塔坡西周古墓群,证实了现在的黎城曾是西周时期黎侯国的中心。2008年,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将其命名为“千年古县”。西汉名将冯奉世墓、东晋西燕王慕容永和后燕王慕容垂作战屯兵台、北魏摩崖石刻等,文化遗存颇多。元代古建筑尚存八处,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遍布全县,都见证了黎城各个时代的历史发展。大量的石刻,浩如烟海,林林总总、气象万千、美不胜收。原置于正社村后土地庙遗址的《北魏造像碑》,文风简练无华,书法更为精妙。书风奇拙秀逸,章法大小参差,疏密相济,结体修促参列,笔法方圆并施,体势飞动,奇纵多变,随意生跌宕之气,拙朴蕴娟秀之美,险绝曲涩中显雄强之力,有书家评议,虽难比同期名碑,但时代风格明显,其历史和书法价值,不唯在黎城称冠,在全国也不为逊色。《宝泰寺浮图碑》,详细介绍了隋代一个县城的佛教建筑及人们对佛教的信仰程度,文章用骈体文撰写,文辞优美,寓意深刻,既是研究佛教的宝贵史料,也是深含哲理的绝佳作品。《山西通志·山右金石记》、《山右石刻丛编》及《黎城县志》(光绪本)中均有收录。

黎城县又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长期在黎城部署军务,指挥战争。“八路军抗战三周年纪念塔”高高耸立在太行山上。华北敌后最大的兵工厂黄崖洞,不仅以敌我伤亡6:1的黄崖洞保卫战的成功战例载入中国军事史册,而且由邓小平题写的《黄崖洞》石刻牌楼,成为黄崖洞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二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地标性建筑。《黄崖洞烈士公墓碑》、《黄崖洞题词碑》和美国友人《韩丁悼念左权将军碑》,以及遍布全县各村的,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所竖立的纪念碑,既是表彰和缅怀革命英雄千古不朽的丰功伟绩的珍贵文物,又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教材。

史迹明人文,金石鉴古今。石刻文化不仅对研究和挖掘历史脉络提供了真实资料,而且这些极为珍贵的文字和书法将对民族文化的繁荣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黎城三晋文化研究会的同志为《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黎城县卷》的编纂付出了大量心血,付梓前夕,谨表祝贺。我们愿将这一成果奉献给三晋人民及有识之士,与大家共同鉴赏。

是为序

概述

黎城县地处山西省东南部,长治市东北部,位于东经 $113^{\circ}15' \sim 113^{\circ}35'$ 、北纬 $36^{\circ}23' \sim 36^{\circ}53'$ 之间,东临河北省涉县,南接平顺县、潞城市,西连襄垣县、武乡县,北界晋中市左权县。全境南北长51公里,东西宽35公里,国土面积1101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638平方公里,丘陵面积342平方公里,平川面积121平方公里,占山西省总面积的0.7%。耕地27.94万亩。年均气温 $9^{\circ}\text{C} \sim 11^{\circ}\text{C}$,无霜期182天,年均降水量343.8~750.6毫米之间,年均日照2548.5小时。县辖黎侯、东阳关、上遥、西井、黄崖洞5个镇和西作、停河铺、程家山、洪井4个乡,250个行政村,16万人。

黎城县历史悠久。从2000年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在靳家街发掘的古黎人半穴居遗址看,距今已有四至五千多年历史。有文献表明,黎城早在商周时期就是黎国、黎侯国,都邑在今县城东北的东阳关村曲后,至今古城墙依存。汉、三国、两晋属潞县地。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废潞县,置刘陵县,隋开皇十八年(598)更名为黎城县。之后,除唐天佑二年(905)曾一度改名为黎亭县外,黎城县名基本沿袭至今。历史上曾有东晋西燕王慕容永和后燕王慕容垂在县境台壁村陈兵8万,争雄天下,形成当时北方局部的暂时统一。古老的历史,造就了一代代英雄豪杰、风流人物。西汉邑人冯奉世平叛靖边,功勋卓著,为西汉巩固和统一立下赫赫战功。

黎城闭锁于群山之中,兼扼晋、冀、豫三省之门户,位居险要,在抗日战争中,是共产党、八路军开辟为太行抗日根据地内完整的县邑之一。著名的东阳关阻击战、响堂铺伏击战、黄崖洞保卫战和两次反“扫荡”等战斗中,显示了兵民合一、殊死克敌的巨大力量。其中,以敌我伤亡6:1的光荣战绩而取胜的黄崖洞保卫战,被中共中央军委评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最成功的一次模范战斗”。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中共北方局高干会议”,也于1940年4月11日至26日在黎城召开,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会址设在黎北县南委泉。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太行区委和曾设立在黎城的黄崖洞兵工厂、小寨冀南银行、下庄被服厂、源泉纸厂、太行学校(炸药厂)、长宁飞机场和广志山后方医院等等,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长期在黎城部署军务,指挥战争。

抗日战争的烽火刚刚熄灭,解放全中国的战争又在上党轰然打响,部署上党战役的指挥部就设在当时的县抗日民主政府,县城正街49号。

黎城县尤以革命纪念地著称于世,境内名胜古迹众多。建于1940年(民国29年)9月18日的“八路军抗战三周年纪念塔”屹立于太行之巅,共山河长存,与日月同辉。雄奇险峻、铁壁如削的黄崖洞因八路军总部兵工厂旧址,而被国家列入国保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辟为国家森林公园和第二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邓小平题额的“黄崖洞”牌楼,成为黄崖洞风景旅游区的地标式建筑。浊漳两岸1942年建造的“小平桥”、“秀峰桥”、“伯承桥”、“省贤桥”,记载着党、政、军、民团结抗战、开渠引水、生产自救的丰功伟绩……此外,蜿蜒起伏于东阳关的长城遗址、明代建筑城隍庙三节楼、文庙,元代圣源王庙、北魏摩崖造像、汉朝名将冯奉世墓等大量的历史遗存,标志着黎城的古老和辉煌。2008年,黎城县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命名为“千年古县”。这一古老的县邑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国内外游客的青睐。

日月照千秋,石刻鉴古今。石刻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石刻文化是人类历史的珍贵资源。黎城县在漫长历史发展中虽留下大量的碑碣,但许多仍未逃脱自然和人为损坏的厄运,尤其是早期的古碑碣几乎损失殆尽。为了挽救金石文化遗产,黎城县有识人士几经潜心挖掘,细心打捞,精心整理,请专家学者编撰了40余万字的《黎城碑文化赏识》,但总以窥一斑而并非见全豹为憾。自编纂《三晋石刻大全》通知下达后,我县即组织队伍,再次进行全面普查拓片,增加近百通。本书共收石刻404通(方),其中碑碣309通(方)、造像碑2通(方)、墓志铭12通(方)、名人题记16通(方)、烈士纪念碑63通(方)。上编现存石刻按年代分为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编为29篇佚失碑刻的碑文。

历史的精彩,今天的抢救,成果的辉煌,值得我们庆贺。现将黎城弥足珍贵的石刻文化资料呈现给三晋人民及全国人民,以资共同鉴赏!

《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黎城县卷》编委会

目 录

凡例	
总序	李玉明
序一	史耀清
序二	郜双庆 郝献民
概述	编委会

上编 现存石刻

●北魏·隋

北魏造像碑(北魏建义元年)	(五)
宝泰寺浮图碑(隋开皇五年)	(七)
仲达墓志铭(隋开皇十八年)	(九)

●唐·五代

唐故阳君之志(唐乾封二年)	(一三)
大唐故齐王府队正冯公及夫人元氏墓志并序(唐永淳元年)	(一四)
唐古处士王君之碣(唐开元十三年)	(一六)
唐故栗府君墓志铭并序(唐开元十八年)	(一八)
唐故陇西李府君雁门周氏夫人墓志铭并序(唐咸通五年)	(二〇)
赞功德院记(唐天祐二年)	(二二)
望夫神女祠记(唐天祐十四年)	(二四)
晋故李府君墓志铭(五代后晋开运三年)	(二六)

●宋·金·元

建造阁古佛堂碑(宋天圣四年)	(二九)
黎城县北刘村明化院杲公塔铭(宋元祐三年)	(三〇)
大金潞州黎城县重修利远桥记(金天会十五年)	(三二)
辛村重修天齐庙正殿碑记(元后至元五年)	(三四)
路堡圣源王庙创修碑(元延祐二年)	(三五)
路堡村重修圣源王庙碑(元延祐二年)	(三六)
七佛祖师堂记(元至正十五年)	(三七)
长宁灵应圣井行祠题诗碑(一)(元至正十六年)	(三九)
灵通济物慈惠法师道行碑铭(元代)	(四一)

●明

黎城县建城隍庙记(明洪武二年)	(四五)
潞州黎城县重修南桑鲁孔子庙碑(明洪武四年)	(四七)
创建潞州黎城县公廨碑记(明洪武六年)	(四九)
郎氏宗谱之记(明洪武二十九年)	(五一)
重修岚王庙记(明宣德八年)	(五四)
重修白岩寿圣寺下院记(明正统十四年)	(五七)
圣水寺遇公禅师道行塔铭记(明成化二十年)	(五八)
重修大圣寺最后毗卢殿碑记(明弘治二年)	(六〇)
菩萨庵重修碑(明泰和二年)	(六二)
古黎重修昭泽龙王碑铭记(明正德六年)	(六三)
重修水陆殿记(明正德七年)	(六五)
建立秀峰和尚灵龕碎金布积普通塔记(明正德十一年)	(六六)
重修东岳庙正殿记(明嘉靖四年)	(六八)
重修源泉庵蛟寺殿宇记(明嘉靖五年)	(七〇)
重修关王庙碑(明嘉靖十五年)	(七二)
圣寿寺重修香亭铭记(明嘉靖十六年)	(七三)
重修三官庙庄塑十王记(明嘉靖十九年)	(七四)
建仙人洞圣水庵明公和尚灵塔记(明嘉靖十九年)	(七五)
东阳关题额碑(明嘉靖二十二年)	(七六)
重建九龙大王神桥碑记(明嘉靖二十二年)	(七七)
重修城隍庙门楼记(明嘉靖三十一年)	(七九)
创建佛塔记(明嘉靖三十三年)	(八一)
新修观音堂记(明隆庆元年)	(八四)
修建洪福庵记(明隆庆元年)	(八五)
南陌镇大圣寺重修二殿山门记(明隆庆五年)	(八七)
创建太山圣母殿宇碑记(明隆庆五年)	(八九)
金妆三官神记(明万历四年)	(九一)
白岩寺牡丹花四绝记(明万历六年)	(九二)
重修庙记(明万历十四年)	(九四)
建昭泽普济龙桥记(明万历十六年)	(九五)
重修观音堂碑记(明万历十七年)	(九七)
山西潞安府黎城县漳源乡北流里重修明化寺碑记(明万历十八年)	(九八)
枣镇村重修三教庙碑记(明万历十八年)	(九九)
涉县为禁约事通知(明万历二十二年)	(一〇〇)
重修龙王庙碑记(明万历二十三年)	(一〇一)
重修大圣寺水陆殿碑记(明万历二十四年)	(一〇三)
重修三官十王殿碑记(明万历二十四年)	(一〇四)
重修三官庙门楼台基创砌两掖道房记(明万历二十七年)	(一〇五)
重淘垒西井记(明万历二十八年)	(一〇七)
修路碑记(明万历三十三年)	(一〇八)
重修石佛庵碑记(明万历四十年)	(一〇九)

黎城县平贤乡辛村子真小疃居创立碑记(明万历四十年)	(一一一)
重修太山圣母行祠记(明万历四十一年)	(一一二)
直指按晋训廉谨刑约言(明万历四十二年)	(一一四)
重修大圣寺碑记(明万历四十二年)	(一一六)
新建三教碑记(明万历四十五年)	(一一八)
东百谷村修关帝像碑(万历四十六年)	(一一九)
创建三教堂碑记(明万历四十六年)	(一二〇)
莅官总要(明万历四十六年)	(一二一)
西关重修三官庙记(明万历四十七年)	(一二二)
修建崇福庵碑记(明天启元年)	(一二三)
秋树园重修碑记(明天启二年)	(一二四)
布政司明文(明天启三年)	(一二五)
黎侯曹公调停院台经过善政碑记(明天启四年)	(一二七)
兵巡道禁约(明天启七年)	(一二八)
新创三教碑记(明崇祯三年)	(一二九)
重修碑记(明崇祯五年)	(一三〇)
创修寝宫记(明崇祯十一年)	(一三一)
过黎城行馆书石(明代)	(一三三)

●清

重修功德院记(清顺治二年)	(一三七)
按院明文(清顺治五年)	(一三八)
创建关圣帝君神庙碑序(清顺治八年)	(一四〇)
重修观音堂碑记(清顺治十七年)	(一四二)
重修仙人洞圣水寺金佛阅藏安阶砌井碑记(清康熙六年)	(一四四)
认粮石碣(清康熙七年)	(一四五)
长宁灵应圣井行祠题诗碑(二)(清康熙九年)	(一四六)
长宁灵应圣井行祠题诗碑(三)(清康熙九年)	(一四八)
重修菩萨岩碑记(清康熙十二年)	(一五一)
为朝阳庵捐地纳资碑(清康熙二十三年)	(一五二)
重修补塑金妆佛像记(清康熙四十一年)	(一五三)
再撰广至中阳山重修天仙庙序(清康熙四十八年)	(一五四)
创建观音阁碑记(清康熙五十一年)	(一五六)
奉宪飭禁碑(清雍正二年)	(一五八)
广志山建立玉皇殿记(清雍正二年)	(一六〇)
重修帝君庙记(清雍正七年)	(一六二)
创建二仙真人祠碑记(清雍正九年)	(一六三)
龙王庙施地记(清雍正十年)	(一六五)
修建二仙庙正殿碑记(清雍正十三年)	(一六六)
广志山鼎大楼序(清雍正十三年)	(一六七)
广志碑记(清雍正十三年)	(一六九)
王公暨元配李孺人合葬墓志铭(清乾隆四年)	(一七〇)
丰则驼村重修龙王庙碑记(清乾隆六年)	(一七二)

南陌镇大圣寺重修中殿山门碑记(清乾隆六年)	(一七三)
施地碑记(清乾隆八年)	(一七五)
施地碑记(清乾隆十三年)	(一七六)
建立香亭碑序(清乾隆十四年)	(一七七)
圣旨碑(清乾隆十六年)	(一七九)
创修五龙庙碑记(清乾隆十七年)	(一八一)
重立圣像碑记(清乾隆二十年)	(一八三)
重修圣王庙碑记(清乾隆二十一年)	(一八四)
王氏远祖莹碑记(清乾隆二十三年)	(一八五)
风洞山记(清乾隆二十五年)	(一八六)
重修关圣庙碑记(清乾隆二十六年)	(一八八)
重修观音阁碑记(清乾隆二十六年)	(一九〇)
北峪蛟孔氏创建圣祖祠序(清乾隆二十七年)	(一九一)
补修田溪桥碑记(清乾隆二十八年)	(一九三)
复立五龙庙碑记(清乾隆三十二年)	(一九五)
修五龙庙碑(清乾隆三十二年)	(一九七)
重修三清庵碑记(清乾隆三十五年)	(一九八)
重修五龙圣殿碑(清乾隆三十八年)	(一九九)
重修关圣阁碑志(清乾隆四十二年)	(二〇〇)
重修关帝庙记(清乾隆四十二年)	(二〇一)
挖池碑记(清乾隆四十四年)	(二〇三)
骆驼等村汲水讼案判碑记(清乾隆四十四年)	(二〇四)
石壁底村创建观音堂珉记(清乾隆四十六年)	(二〇五)
东井泉水断分碑记(清乾隆四十六年)	(二〇六)
观音堂重修碑记(清乾隆四十八年)	(二〇七)
重修闫君殿碑志(清乾隆五十一年)	(二〇八)
重修大楼碑文(清乾隆五十一年)	(二〇九)
北峪蛟创建关帝庙碑记(清乾隆五十四年)	(二一一)
捐地护庙碑记(清乾隆五十五年)	(二一三)
重修东西两殿序(清乾隆五十七年)	(二一四)
重修龙王庙两廊碑记(清乾隆五十七年)	(二一五)
大圣之古庙迁移重修碑记(清嘉庆元年)	(二一六)
重建庙碑记(清嘉庆四年)	(二一七)
圣泉寺重扶碑记(清嘉庆五年)	(二一九)
重修莺沟口广生圣母庙碑记(清嘉庆五年)	(二二〇)
秋树垣重修关帝庙碑记(清嘉庆六年)	(二二二)
重修广生祠碑记(清嘉庆六年)	(二二三)
重修文庙序(清嘉庆八年)	(二二四)
娲皇圣母庙碑文(清嘉庆八年)	(二二六)
重修西阁序(清嘉庆九年)	(二二七)
永禁碑记(清嘉庆十年)	(二二八)
重修观音堂碑记(清嘉庆十五年)	(二二九)
仵桥禁赌碑(清嘉庆十八年)	(二三〇)